

# 從鄂圖曼外交到土耳其外交

## From Ottoman Diplomacy to Turkish Diplomacy

陳立樵

輔仁大學歷史系

### 壹、前言

1923年10月，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建立，宣告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走入歷史。土耳其積極西化為人們所肯定，反觀近代鄂圖曼卻落得保守、衰敗、崩壞老帝國的形象。但是，土耳其真的甩開了鄂圖曼的舊包袱，然後昂首闊步擁抱進步與強盛的西方嗎？或者，是否鄂圖曼本來就已經走在以西化成果來捍衛自身權益的路上，土耳其只是承繼了前人的成果？

學者阿伊丁（Mustafa Aydin）以及阿克山（Virginia H. Aksan）的研究，都討論了鄂圖曼與土耳其外交政策之間的延續性，偏重於大面向的比較與分析。<sup>1</sup> 本文則是試圖以上述兩位學者的論述作為出發點，針對從鄂圖曼瓦解到土耳其建立這段時間裡外交面向的探討。

---

<sup>1</sup> Mustafa Aydin, "Determinant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Framework and Traditional Input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5:4(1999), pp.152-186;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to Turk: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61:1(2005/2006), pp. 19-38.

## 貳、鄂圖曼帝國晚期的對外關係

18 世紀後期，鄂圖曼相較於歐洲來說已經有軍事武力屈居下風的情況，遂逐步開始進行西式軍事變革，「西化」在往後拓展到了制度、內政、外交層面。1839 年，鄂圖曼君主頒布《花廳御詔》(Golhane Edict)，旨在追尋公平正義，例如保障生命與財產的公正性、維護人民利益、禁止賄賂之外，還強調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一律平等。<sup>2</sup>由最後一部分可以看到，此時鄂圖曼對外接觸已經太過頻繁，許多境內非穆斯林的人口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必然要做政策調整才能符合當下的時代氛圍。這便開啟了往後意味著「重組」與「改革」的「坦志麥特」(Tanzimat) 進程。

1854 年，法俄兩國為了取得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的保護權，最後演變成英法聯合鄂圖曼對抗俄國，於 1856 年 2 月停戰，是為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3 月，交戰國簽署了《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of 1856)，其中的條文寫道：「鄂圖曼帝國承認加入歐洲將有所獲益」，另外歐洲強權也「尊重鄂圖曼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sup>3</sup>學者認為這是鄂圖曼加入了「國際家庭」(Family of Nations) 之中，<sup>4</sup>也有人說這是鄂圖曼加入了「歐洲俱樂部」(European Club)。<sup>5</sup>無論鄂圖曼主動或者被動加入「國際家庭」，其實都是外交方面不得不做的事情，畢竟那個時期非西方地區都要為西方而「打開大門」。這並不

---

<sup>2</sup> 悉納·阿克辛著，吳奇俊、劉春燕譯，《土耳其的崛起（1789 年至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頁 34。

<sup>3</sup>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1914-1956 Volume 1*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56), p.154.

<sup>4</sup> 徐中約著、屈文生譯，《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 年間的外交》（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頁 8。

<sup>5</sup> Benjamin C. Fortna, "The Reign of Abdülhamid II," in Reşat Kasaba,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4: Turkey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4.

代表非西方地區不願意與西方接觸，而是只要開始玩西方的遊戲規則，才有機會在這樣的國際局勢發展中生存下去。

19 世紀中後期，俄國勢力盤據高加索（Caucasus）與中亞，英國則在 1857 年正式殖民印度，雙方在亞洲內陸的「大賽局」（Great Game）競爭頗為激烈，鄂圖曼與伊朗都夾在其中。<sup>6</sup>1870 年之後崛起的德意志帝國（後文稱德國），便成為鄂圖曼尋求合作以擺脫英俄壓力的重要對象。1888 年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讓德國勢力也能夠壟罩世界，西亞地區當然也是德國的目標。1898 年，威廉二世出訪鄂圖曼，表明想要作為穆斯林的好友，<sup>7</sup>也有「進入東方」（Drang nach Osten or Drive to the East）的企圖心，<sup>8</sup>除了與西亞穆斯林合作之外，也希望印度穆斯林起義逼英國與德國和談。<sup>9</sup> 1903 年，德國向鄂圖曼取得巴格達鐵路（Baghdad Railway）的利權，鐵路終點站設在巴格達（Baghdad），相當逼近英國在波斯灣的勢力範圍。

1876 年，鄂圖曼君主阿布杜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支持西式憲法制訂以整頓政局，但相對地君主權力受到限制。結果，在隔年對俄國的戰爭，鄂圖曼失利，使得阿布杜哈米德二世便認為君權受制於憲法才是帝國更加困頓的因素，因而終止國會運作。這並非保守與改革路線衝突的問題，而是鄂圖曼內政與外交都處於劇變之下，必然會有路線須頻繁做調整、甚至茫然沒有方向的情況。1904

---

<sup>6</sup> 「大賽局」的研究，可參考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sup>7</sup> Ulrich Tru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

<sup>8</sup> Jules Stewart, *The Kaiser's Mission to Kabul: A Secret Expedition to Afghanistan in World War I*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4), p.7.

<sup>9</sup> Eugene Rogan, "Rival Jihads: Islam and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18,"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4, 2016, p.3.

年俄日戰爭（Russo-Japanese War）爆發，隔年俄國戰敗後思索新的國家發展路線，學習日本制定憲法，以求建立國家富強的基礎。1908年，鄂圖曼進行第二次的立憲運動。鄂圖曼的政治正在轉型，都是嘗試要讓帝國向「西」邁進，加強自身實力與提高國際地位。

1914年7月大戰爆發之後，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組成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與英國、法國、俄國的「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交戰。11月，鄂圖曼加入德國陣營，把戰場從歐洲拉進了西亞地區。儘管這場大戰並非鄂圖曼引起，但其實歐洲強權為了在鄂圖曼爭奪利益，早已讓鄂圖曼成了外交戰場。鄂圖曼試圖藉著大戰，除掉英法俄等壓迫者。不過，英法俄之間有些秘密協議，最著名的就是1916年英國與法國的《塞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將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與敘利亞（Syria）地區瓜分；<sup>10</sup>其實這也有俄國的參與，俄國得到黑海與高加索地區。<sup>11</sup>戰爭局勢未明，但強權的交易其實已經不重視鄂圖曼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

### 參、鄂圖曼與安卡拉政府共同維護主權

1918年，當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倡議「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原則為眾人所知之後，幾乎受壓迫過或殖民過的國家與族群，都很期待威爾遜這位與歐洲帝國主義者截然不同的新世代救主，來解放大家脫離帝國主義者的摧殘。不過，最後大家都發現，威爾遜根本沒有能力可以改變情勢。而且，美國自

---

<sup>10</sup> 詹姆斯·巴爾著、徐臻譯，《瓜分沙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34-36。

<sup>11</sup> 西恩·麥克米金著、黃中憲譯，《終局之戰（下）：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和現代中東的形成》（新北市：左岸文化，2019年），頁59-62。

18 世紀後期建國以來，主張不介入歐洲事務、維持孤立路線，儘管 20 世紀初期美國在太平洋、東亞都已有所影響力，但西亞還是歐洲強權佔有優勢。

1918 年 10 月 30 日，鄂圖曼伊斯坦堡政府與戰勝國簽訂《蒙德羅斯停戰協定》(Mudros Armistice)，黑海海峽 (Black Sea Straits) 完全開放，<sup>12</sup>協約國可以任意徵用鄂圖曼商船、港口、鐵路。<sup>13</sup>在戰爭期間頗有戰果的凱末爾 (Mustafa Kemal) 將軍則試圖聯合有志之士繼續抵抗戰勝國。不少對於伊斯坦堡政府已經不信任的鄂圖曼將領紛紛加入凱末爾的行列。儘管伊斯坦堡政府在 1919 年 10 月同意在與凱末爾合作，後者堅持要在安卡拉召開國會，以避開戰勝國的壓力。然而，戰爭結束之後，英法軍隊都進入了《塞克斯－皮科協議》所得到的勢力範圍，但都面臨阿拉伯人嚴重的抵抗，1920 年於伊拉克、敘利亞都有嚴重的抗爭運動。<sup>14</sup> 對此，伊斯坦堡政府與凱末爾均無能為力。

1920 年 1 月，伊斯坦堡公布《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重點是「鄂圖曼帝國所有領土，無論在停戰協定規定的邊界內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阿拉伯領土等地區 (意即遭到戰勝國佔領的地區) 的命運，可以通過當地民眾投票來決定」。<sup>15</sup>《國民公約》表現出鄂圖曼要脫離戰勝國控制的企圖，且相當符合那時「民族自決」的氣氛，伊斯坦堡政府的決定並沒有問題，卻不符合英法利益，何況後

---

<sup>12</sup> 黑海海峽即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與博斯普魯斯海峽 (Bosporus)。

<sup>13</sup>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1914-1956 Volume 2*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56), pp. 36-37.

<sup>14</sup> Abbas Kadhim, *Reclaiming Iraq: The 1920 Revolu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odern Stat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Michael Provence, *The Great Syri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sup>15</sup> 阿克辛著，吳奇俊、劉春燕譯，《土耳其的崛起 (1789 年至今)》，頁 162。

者早已決定佔領阿拉伯地區，伊斯坦堡政府卻主張遭佔領區可以自己決定未來的發展。儘管阿拉伯人的決定不見得傾向鄂圖曼，但一定不會認同英法兩個外來強權。英法必然也知道阿拉伯人絕不會讓自己受外力控制，所以《國民公約》形同再次挑戰戰勝國權威。結果，《國民公約》之後，伊斯坦堡政府遭到戰勝國的占領，讓鄂圖曼帝國更是形同空殼一般。可見，「民族自決」雖不完全是空談，但卻是有身份限制，戰敗國就沒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凱末爾相當不滿這個結果，4月在安卡拉組成「土耳其國民議會」(Turkish National Assembly)，形成伊斯坦堡與安卡拉對峙的狀態。由凱末爾以「土耳其」為議會名稱，可看出他想要拋開「鄂圖曼」這個已經行將就木的崩潰帝國。

同一時期，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成立，對於戰敗國殖民地與統治地區進行「委任託管」(mandate)。英國與法國依《塞克斯-皮科協議》佔領的地區藉由「委任託管」方式而合理化，並在1920年4月確認了兩國勢力範圍，英國託管美索不達米亞與巴勒斯坦，法國託管敘利亞與黎巴嫩。<sup>16</sup>由於美國國會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美國也就因而不能成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更不可能落實。國際聯盟等於讓英法兩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掌握，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仍然是那時候的主流氣氛。不過，馬內拉 (Erez Mamela) 認為，即使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也不見得能夠讓這個立場超然的國際組織「認同殖民地的自決主張」，<sup>17</sup>言下之意就是說「民族自決」在那時很難與仍然盛行

---

<sup>16</sup> 尤金·羅根著、何修瑜譯，《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6年)，頁485。

<sup>17</sup> 埃雷斯·馬內拉著、吳潤璿譯，《1919：中國、印度、埃及、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新北市：八旗文化，2018年)，頁344。

的「殖民主義」抗衡，「委任託管」就等於是英法將殖民政策換個方式呈現而已。

1920年8月，戰勝國與伊斯坦堡政府簽署《色弗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提到「鄂圖曼原本的阿拉伯省分將以委任統治的形式來管理。伊拉克與巴勒斯坦為英國委任託管地，敘利亞劃歸為法國的委任託管地。」<sup>18</sup>《色弗爾條約》幾乎把鄂圖曼拆解得支離破碎，戰勝國僅剩餘安卡拉的凱末爾勢力還未能消除。伊斯坦堡政府並非喪權辱國，而是無法抵抗戰勝國。安卡拉政府的影響力相對地越來越強，使得戰勝國開始正視凱末爾的存在。1921年3月，蘇俄與安卡拉政府《莫斯科條約》(Treaty of Moscow)，其中一個條文就是「不承認國際間的和平條約」，<sup>19</sup>亦即兩方都不承認《色弗爾條約》。原本沙皇時期的俄國是鄂圖曼的對手，但1917年11月經歷過蘇維埃革命(Soviet Revolution)之後，社會主義者列寧(Vladimir Lenin)掌握俄國政權，主張這場戰爭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社會主義國家不再參與，而且蘇維埃俄國將退出戰場、放棄過去俄國在各地的特權。蘇維埃與安卡拉這兩個屬於國際社會中的「邊緣人」，試圖結合起來挑戰戰勝國強硬且不合理的要求。

同年10月，法國在敘利亞的統治一直與安卡拉存在衝突，不得不與凱末爾妥協，簽署了《安卡拉條約》(Ankara Agreement)，同意撤離在安那托利亞南部的軍隊，而安卡拉政府也不再攻擊敘利亞北方。<sup>20</sup>由此可見，對法國來說，敘利亞的抗爭相當難以處理，凱末爾

---

<sup>18</sup>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1914-1956 Volume 2*, pp. 84-85.

<sup>19</sup>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1914-1956 Volume 2*, p. 95.

<sup>20</sup>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1914-1956 Volume 2*, pp. 97-100.

勢力成為另一股威脅，導致法國必須跟凱末爾達成勢力範圍劃分的共識。1922 年安卡拉政府不再承認伊斯坦堡政府的合法性，<sup>21</sup>更代表凱末爾勢力已經凌駕伊斯坦堡。1923 年 7 月，戰勝國與安卡拉政府簽訂《洛桑條約》(Lausanne Treaty)，後者取得安納托利亞，但得放棄鄂圖曼其他地區的主權。<sup>22</sup>同年 10 月，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凱末爾作為第一任總統。

其實，安卡拉政府並沒有取得比伊斯坦堡政府更多的優勢。畢竟英法在美索不達米亞與巴勒斯坦的控制已經是既成事實，凱末爾也沒有辦法改變什麼。不過從《色弗爾條約》到《洛桑條約》，都可看出鄂圖曼與凱末爾政府維護國家主權的努力。

#### 肆、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初期的民族意識

土耳其建國之後，凱末爾仍然延續自鄂圖曼以來爭取國家權益的外交路線。介於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的摩蘇爾 (Mosul) 成了土耳其與英國對峙升溫的另一問題。此處依《塞克斯-皮科協議》原劃分在法國勢力範圍，但其實法國比較在意黎凡特地區 (Levant)，即今日敘利亞與黎巴嫩及其周邊，所以在《塞克斯-皮科協議》簽立沒多久後，法國便有意放棄摩蘇爾，以致英國軍隊於大戰結束時直接進入該地區。<sup>23</sup>

凱末爾一再表明要收復摩蘇爾，英國當然無意放棄，且也企圖要控制這區域豐富的石油礦產。對凱末爾而言，摩蘇爾是鄂圖曼時

---

<sup>21</sup> 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Empire," in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911-19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3.

<sup>22</sup>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1914-1956 Volume 2*, pp. 119-121.

<sup>23</sup> Edward Peter Fitzgerald, "France's Middle Eastern Ambitions, the Sykes-Picot Negotiations, and the Oil Fields of Mosul, 1915-1918,"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6:4(1994), pp.697-725.



期的一個省份，有必要收復，對英國而言，摩蘇爾是加強其影響力的重要區域。英國想要把摩蘇爾歸屬問題交給國際聯盟處理。有土耳其國會議員認為，「把摩蘇爾問題交給國際聯盟，就等於直接交給英國一樣」，因為「國際聯盟就是英國」。<sup>24</sup> 此一說法並不偏頗，因為美國沒有加入國際聯盟，主導往後世界局勢發展的主角確實就是英國（以及法國）。

摩蘇爾問題也牽涉到庫德族（Kurds）能否獨立的問題，主要因為摩蘇爾地區與土耳其東部領土有相當多庫德族人口，且《色弗爾條約》決議給庫德族自治機會，<sup>25</sup>這並不意味戰勝國同情庫德族，而是為了盡可能瓦解鄂圖曼。儘管部分庫德族曾與凱末爾合作對抗英國，但《洛桑條約》並未談及庫德族問題，且 1924 年凱末爾廢除「哈里發」（Caliph）使得往後穆斯林社群缺乏統一領導者，令不少穆斯林不悅。庫德族教長（Sheykh Said）發動抗爭行動，<sup>26</sup>導致凱末爾不僅要處理對外關係，還面臨境內族群問題。凱末爾政府後來放棄摩蘇爾，1926 年簽署了對伊拉克的邊界條約，可能受到國際聯盟與庫德族的壓力所影響，不得不對現實做妥協。

在凱末爾為土耳其的主權與領土奮鬥之際，摩蘇爾與庫德族問題結合起來，導致凱末爾政府往後不承認庫德族的存在，憲法條文裡將庫德族定義為「山地突厥人」（Mountain Turks）。<sup>27</sup>這對庫德族

---

<sup>24</sup> Sevtap Demirci, "Turco-British diplomatic Manoeuvres on the Mosul Question in the Lausanne Conference, 1922-1923,"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7:1(2010), p. 64.

<sup>25</sup>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著、鄧峰譯，《巴黎和會：締造和平還是重啟戰爭？重塑世界新秩序的關鍵 180 天》（台北：麥田出版，2019 年），頁 536-542。

<sup>26</sup> Nevin Coşar and Sevtap Demirci, "The Mosul Question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Before and After the Frontier Treaty, 192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2:1(2006), pp. 123-132.

<sup>27</sup> W. G. Elphinston, "The Kurdish Ques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1(1946), p. 97.

是莫大的羞辱，可是對凱末爾來說，庫德族獨立的問題是英國挑起的，所以否認庫德族的存在就是對抗帝國主義，不願意讓英國的影響力還遺留在土耳其。而土耳其與伊拉克簽署邊界協議之後，等於把庫德族切割到兩個國家境內，<sup>28</sup>也代表英國實際並不在意庫德族問題，只在意不讓土耳其進入摩蘇爾地區，以避免破壞英國在這區域的優勢。

土耳其共和國政府強調「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路線，即單一民族建立國家，便是要塑造土耳其共和國是土耳其人家園的氣氛。<sup>29</sup> 因為如此，土耳其對外抵禦西方帝國主義之際，對內則造成所謂少數族群越加不滿，使得庫德族與土耳其政府的衝突至今未能解決。不過，在鄂圖曼後期其實就有這樣的氛圍，伊斯坦堡政府主張「鄂圖曼主義」(Ottomanism)要集結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來重建鄂圖曼，充滿愛國主義意涵。<sup>30</sup> 然而，這正如美國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民族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不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也因為這樣的情感，信者願意為了民族而去屠殺他人或者自我願意壯烈犧牲。<sup>31</sup>

土耳其共和國要做為土耳其民族的國度，進一步的就是要刻意要同化其他族群，庫德族便是面臨這樣的遭遇。民族主義路線就是陷入西化的窠臼裡，一切「向西看齊」反而對自身的發展帶來一部

---

<sup>28</sup> 其實是四個國家：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但敘利亞與伊朗庫德族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sup>29</sup> 史蒂本等編，林佑柔譯，《土耳其化的伊斯蘭》(新北市：光現出版，2017年)，頁115-117。

<sup>30</sup> Carter Vaughn Findley, "The Tanzimat," in Reşat Kasaba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4: Turkey in the Modern World*, p. 30.

<sup>31</sup> 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7。

份負面的影響，讓國內族群關係有許多不和睦情況。但這不代表土耳其政府決策錯誤，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國家秩序穩定。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許多國家的西化也都推動統一民族運動。不過，各國家在強調民族至上理想時，仍是複雜族群集結一體的現實狀態，歐洲也是一樣。固然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要浪潮，反而帶來過於單一、排外的問題。

土耳其建立後，儘管有些問題產生，其實僅延續了許多鄂圖曼時期已經進行的事情。如同阿塔巴基 (Touraj Atabaki) 所說：「共和制度並非凱末爾首創，而是在坦志麥特時期就已經在知識份子階級裡熱烈討論了。」<sup>32</sup>其意涵就是，如果人們認為凱末爾西化的進度快速，其實是因為鄂圖曼已奠定了一段時間的基礎。很多事情是伊斯坦堡政府就努力進行的事情，並不是凱末爾有多麼與眾不同，只是時代不同，成果不一樣。凱末爾若真的屬於人生勝利組，那也是因為他接續了前人的成果。

## 陸、結語

從鄂圖曼到土耳其的外交，可以看到很鮮明的延續性，沒有斷裂的面向。以鄂圖曼連結德國、對抗英法俄的情況來看，德國扮演讓鄂圖曼得以整合的關鍵角色。只不過一次大戰鄂圖曼戰敗，隨後因為英法的瓜分，鄂圖曼才走入歷史。鄂圖曼並非衰弱而崩潰，反而是被一戰戰勝國強制瓦解。

在大戰結束之後，雖然鄂圖曼分出了伊斯坦堡政府與安卡拉政

---

<sup>32</sup> Touraj Atabaki, "The Caliphate, the Clerics and Republicanism in Turkey and Iran: Some Comparative Remarks," in Touraj Atabaki and Erik J. Zürcher (eds), *Men of Order: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under Atatürk and Reza Shah*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4), p. 46.

府，兩者都致力捍衛權益。伊斯坦堡政府並非無能，《國民公約》就是捍衛主權的方式，只是一切都受到戰勝國的箝制。安卡拉政府其實並沒有做出更多貢獻，只是在軍事方面尚為強勢，致使《色弗爾條約》難以落實，戰勝國必須承認安卡拉政府，也必須與其簽訂《洛桑條約》，以求終止凱末爾勢力對於戰勝國的傷害。

凱末爾其實已經沒有能力重建鄂圖曼帝國，故主張擺脫一切歷史束縛，試圖重新開始。不過，土耳其共和國難以完全切割鄂圖曼的歷史，畢竟凱末爾對抗西方帝國主義、捍衛國家權益的工作，主要還是建立在鄂圖曼晚期西化的基礎上。鄂圖曼的外交政策完全由土耳其接續下去，舊帝國瓦解並不代表就此進入全新時代，而是由新政府延續既定的工作行程，進行下一階段的努力。